

目 录

第十七卷

(一)书院、私塾、科举、学堂

- 经心书院略述 杨湖樵(1)
- 武昌文华书院及其身后华中
- 大学 韦卓民(6)
- 复性书院与马一浮先生 丁敬涵(15)
- 辛亥革命前后的私塾生活 王楷元(22)
- 私塾回忆 李铁夫(25)
- 济南的私塾和我的经历 王益如(31)
- 严修与学制改革 王芸生(38)
- 科场回忆录 钟毓龙(49)
- 清末考试制度 杜慕堂(67)
- 清末科举童子试的形
- 色色 易力原(70)
- 我考取末科秀才的经过 苏局仙(77)
- 清末广州科举与学堂过渡时
- 期状况 沈琼楼(80)
- 我所经历的清末直隶省几所
- 学校 薛允中(92)
- 山西大学堂初创十年间 王家驹(96)
- 记河南高等学堂 张遵青(101)
- 两湖书院——两湖总师范
- 学堂 朱峙三(104)
- 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概况 李愈友(108)
- 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
- 回忆 赵元贞等(111)

(二)中小学

- 李墨飞和上海万竹小学 徐昭侯(116)

忆河南省立小学和廉方教

- 学法 许一默(118)
- 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小学 毛遂之(122)
- 回顾北京汇文中学 王振乾(125)
- 记慕贞女校 马 燕(132)
- 贝满女中校长管
- 叶羽 黄亦平 李爽麟(139)
- 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 钱秉雄(147)
- 回忆通县潞河中学 陈昌祐 刘汝英(154)
- 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 薛 正(159)
- 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 周浩泉(168)
- 忆天津官立中学 刘家骏 汪桂年(176)
- 早期的南开中学 黄钰生(183)
- 回忆河北省立十七中 赵捷民(191)
- 奉天维城学校 荣恒山(194)
- 忆吉林毓文中学 祝步唐(198)
- 解放前的开封高中 高韦伯(202)
- 忆开封北仓女中 胡绍芬(209)
- 我的母校迪化女中 张式琬(215)
- 南昌葆灵女中往事回忆 周兰清(219)
- 重庆广益中学生生活忆旧 叶 语(224)
- 解放前的昆仑中学 马鸣狮等(229)

(三)高等院校

- 我国近代教育家马相伯 马一民(233)
- 我所了解的唐文治 钱钟韩(237)
- 我的父亲杨昌济 杨开智(240)
- 张伯苓与南开 张锡祚(245)
- 何燮侯事略 何荣穆(264)
- 许寿裳传略 许世玮(269)
- 回忆父亲钱玄同 钱秉雄(280)
- 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286)

有巨大凝聚力的大学校长竺

- 可桢……………谈家桢(292)
- 怀念姜立夫先生……………吴大任(295)
- 熊庆来先生事略……………孔庆福(302)
- 追怀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吴忠亚(306)
- 朱家骅和教育事业……………严在宽(315)
- 嵇文甫的一生……………嵇立群(320)
- 最早向中国传播相对论的魏
- 时珍……………范敬一(331)
- 茅以升与唐山交大……………茅于美(339)
-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陈中凡(346)
- 黄季陆与川大……………李有为(352)
- 怀念厦大校长萨本栋……………郑寿岩等(359)
- 焦菊隐在师大……………徐康(367)
- 我和北大……………沈尹默(374)
-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梁漱溟(382)
-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朱 僦(387)
-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
- 清华……………冯友兰(400)
- 清华学风和我……………王造时(405)
- 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车铭等(410)
- 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聂崇岐(432)
-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邓家栋(437)
-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
- 影响……………叶恭绍(442)
- 北平解放前夕的中国大学……赵如志(447)
- 回忆北洋大学……………茅以升(453)
- 北洋大学回忆片断……………张含英(456)
- 抗战前的唐山交通
- 大学……………赵竞存 刘秉中(460)
- 河北农业大学忆往……………苏润之(463)
- 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
- 前前后后……………郭民任(469)
- 冯庸与冯庸大学……康德一 曲柏峰(478)
- 复旦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赵少荃(487)
- 复旦校长李登辉……朱仲华 陈于德(494)
- 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
- 大学……………郑朝强(504)

- 驰名中外的上海交通大学……陈貽芳(516)
- 忆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李清悚(522)
- 怀念母校中央大学……李永刚(526)
- 金陵女大四十年……吴貽芳(533)
- 我所了解的金陵大学农
- 学院……………邵仲香(544)
- 浙江大学在遵义……………幸必达(547)
- 筹办厦门大学的回忆……………郑贞文(554)
-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 忆往……………郭肇民(559)
- 济南齐鲁大学……………王神荫(567)
- 杨振声和国立青岛大学……王先进(583)
- 忆河南大学……………张遵青(587)
- 焦作工学院始末……………张仲鲁(593)
- 记武昌华中大学……………艾玮生(599)
- 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凌敏猷(604)
- 回忆广东国民大学……朱勉躬(610)
- 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始末……欧正仁(618)
- 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大学……伍子玉(625)
- 东陆大学创办记……………董雨苍(632)
- 西北师范学院史略 ……李爱民 曹怀玉(636)
- 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
- 学校……………刘德恩(639)

(四)师范教育

- 五十二年的北京师范学校……刘士杰(642)
- 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张绍祖(650)
- 回忆河北省第八师范
- 学校……………康维之 唐希贤(658)
- 我所知道的奉天两级师范
- 学校……………崔伯阜(661)
- 成达师范简介……………艾宜载(667)
- 晓庄师范与联村自卫团……邵仲香(671)
- 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的
- 五年……………李茂永(674)
- 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记……艾毓英(678)
- 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回忆……薛慕桥(683)

(五) 职业教育

- 中华戏曲学校忆往…………… 王金璐(686)
- 回忆直隶公立工业专门
学校…………… 张今生(712)
- 我的母校——协和护校…………… 王琇瑛(717)
- 忆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郭 真(727)
- 记山西外国文言学校…………… 吉范五(731)
- 奉天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追忆…………… 吴建白(735)
- 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片断…………… 蔡秩伦(738)
-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
发展…………… 潘序伦(740)
- 回顾上海戏剧学校…………… 张正芳(747)
- 民初创办的贵州劝工局…………… 尹赞卿(772)
- 和路易·艾黎相处的日
子里…………… 靳东岳(775)

(六) 平民教育

- 晏阳初——向愚昧贫穷开火的
斗士…………… [美]约翰·赫尔塞(779)
- 平民教育运动在定县…………… 堵述初(792)
- 任定县实验县长的回忆…………… 霍六丁(804)
- 我与平教会…………… 傅葆琛(807)
- 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
查工作…………… 李景汉(809)
- 和陶行知在一起的日子…………… 汪刃锋(813)
- 陶行知在上海的最后几
个月…………… 张文郁(819)
- 生活教育社在广西…………… 刘季平等(823)

- 回忆重庆社会大学…………… 杨 乔(826)

(七) 留学生

-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 徐特立(830)
- 回忆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
及华法教育会…………… 彭济群(833)
- 高阳布里村留法工艺
学校…………… 齐连登 段子均(844)
- 在法劳动、学习生活的回忆 …… 齐笏屏(848)
-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黄里州(851)
- 留欧纪实…………… 李仪祉(876)
- 在意大利的两个春秋…………… 周 尧(887)
- 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 于树功(893)
- 从田纳西大学到兰州大学…………… 郑国锷(896)
- 忆中华留日戏剧协会…………… 颜一烟(899)
- 忆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 涂心园(902)
- 我所知道的伪满日本士官学
校派遣生…………… 郭嫩日图(907)

(八) 其他

- 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 金淑琴(909)
- 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始末…………… 荣典岑等(919)
- 解放前的宁夏教育 …… 席怀瑜 梁碧梧(923)
- 解放前贵州教育见闻…………… 熊绍儒(928)
- 香港教育旧事…………… 陈 谦(940)
- 从事盲聋哑教育的经历…………… 罗蜀芳(956)
- 我所经历的教会学校…………… 李辉祖(973)
- 中国童子军教育始末…………… 李养义(978)

(一) 书院 私塾 科举 学堂

经心书院略述

杨湖樵

书院之名，始于唐书；书院之制，创于唐末、五代，是封建社会时期培养士子的一个较有名的机构。湖北从何时开始设置书院，难以远索，根据《湖北通志》所载：明朝时的提学葛寅亮在省会文昌门内设有江汉书院，嗣后迁到巡道岭。清同治年间复建有经心书院。清光绪间又建有两湖书院。清末变法兴学时，一般人所说的三书院就是指此而言。现就我肄业的经心书院所回忆到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经心书院的设立和建制

经心书院是1869年（清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所创建，院舍设在省会三道街文昌阁。翌年迁于文昌门附近的火星堂。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学政洪钧捐廉添建斋舍。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学政赵尚辅捐廉迁建于三道街，规模相当宏大，就是学生斋舍计有四栋，每栋20间，院后山上有天文台和图书室。现在武汉市第四十六中学，是其故址。

书院初开办时，例设山长一人主持院事，其人选是由当时督抚延聘品学兼优，负有相当威望者充任之。所谓山长，即是现在的院长，但何以不名院长而称为山长呢？简明地说，是采用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称他为山长的这个典故而来的。山长以下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职。但在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张之洞所延聘负全院之责的不名为山长，而改名为监督，因之经心书院主持院事者亦随之改为监督了。监督以下设有提调一人（相当于副监督，亦即前之副山长），负责管理学生及院中一切事务，监院三人，负责指导学生守规则，讲卫生和掌理学生请假及旷课的登记事宜。关于课务的讲授，按所设学科各设分教一人。依此规制直到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经宣布经心书院并入两湖书院而告终。在此亦应附带说明的：在经心书院并入两湖书院的前一年，江汉书院只有40人，因所学科目相同，已于1903年并入到经心书院一同上课。可说到1903年后，三书院只实存一个两湖书院了。

教职员的聘用与学生的来源

经心书院初开办时，山长为谁已无从查知。在我于1899年蒙俞学政挑入经心肄业时，山长之名已废，负全院总责的监督是吴兆泰（麻城县人），闻系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任。下设提调一人，先后由张之洞指派双寿、黄绍第、高凌霄充任。监院为吕承源、杜承预、范著臣三

人，亦由张之洞所派充。至各学科的分教，均由监督聘请。如天文学分教为叶青、舆地分教为姚炳奎、兵法分教为蒋克武、算学分教为曹汝川。另如经史阅卷分教为纪钜维。

经心书院规定为 80 个学生名额，均由学政分年在考取秀才或廪、增生中挑选而来。学生到书院后，除每人分住斋舍一间外，按月给予膏火费库平银 3 两，折合银元 4 元 5 角（库平银 6 钱合银元 1 元），作每月伙食和杂用费（当时伙食费每月约 3 元，其余 1 元 5 角作杂用）。至若服履方面，日常所穿操衣和皮靴，按季换发，并发蓝布长袍、青布马褂各一件作为礼服，关于学习用品，如笔墨、抄本更不待说，由书院按所需要发给。此外还按月考成绩发给奖金，超等八元，特等六元，平等四元。在当时优秀学生，每月所得的奖金即可赡养家室了。因此，学生们在没有比之更好的出路时，是不愿轻易离开书院的（因书院对学生的学期，没有一定的明文规定）。

开学典礼和朔日谒圣制

书院的假期，规定有年暑假和旬假。在年假结束，学生到齐后，就要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后每逢朔日亦齐集学生到礼堂举行谒圣典礼。这项礼节，可以说是书院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部分，而且具有其特色。

在选定开学期前，由书院监督奉报总督，请其届时莅院赐训，总督如期前来时，藩、臬、道台及武昌府县知事们都前来相侍候（不论书院函请与否），一俟开学时间到达，督抚司道齐集，就由书院执事人等，把礼堂圣位前烛燃好，率领学生进入礼堂列队站在指定地点，再由监督、提调等陪同各官长进入礼堂，督抚司道站在最前列，监督、提调、分教们在第二列。如此站好后，由呼礼生照礼单秩序唱呼：

- （一）各位长官、书院监督、各位分教与学生齐向孔圣人行跪拜礼；
- （二）各位长官东列，各位师长西列，学生向各位长官行跪拜礼（学生半左转）；
- （三）学生向各位师长行跪拜礼（学生向右转），复位；
- （四）长官向师长行三鞠躬礼；
- （五）各位师长西列，各位长官东列，师长向长官行鞠躬礼；
- （六）学生从中行起左右转，相互行一鞠躬礼；
- （七）长官、师长、学生各复原位；
- （八）请总督训示；
- （九）请监督训示；
- （十）礼成（长官先退，师长随退，学生最后退）。

至每逢朔日，谒圣礼则较简单，大致是这样的：在朔日的上午 8 时，由院中执事人员把礼堂圣位前香烛点燃，率领学生列队进入礼堂指定地位站定，然后由监督带领提调、分教等人员进入礼堂，站在圣位前肃立，由呼礼生照礼单秩序唱呼：

- （一）齐向至圣先师行三跪拜礼；
- （二）师生向后转，学生齐向师长行跪拜礼；
- （三）学生从中左右转，互行一鞠躬礼；
- （四）各复原位；

(五) 监督训示 (有时不讲);

(六) 礼成 (师长先退, 学生后退)。

从这些礼节来看, 固然是表示出封建教育的一种陈俗, 但就另一方面说, 却也表现出当时的尊师重道。

学生学习及学行考核

经心书院刚开办时, 关于教学方面, 只注重研究古学, 所研究的学科, 分为注解、史论、诗赋、杂著四种, 就各人兴趣专习一种或两种。各科设有分教, 不作班级的教学, 只备学生的随时提问, 那时的教学法只注重个人自由研究。奖励方面, 按月考课一次, 由监督总核成绩发放奖金。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鉴于甲午战败, 非变法不足以图强, 乃将书院制度加以改变, 趋重肄业诸生的科学学习, 于是废除旧的学习科目(实仍作为课外学习), 改为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科, 每科限定学额20人, 分年轮习。并定下无论学习任一学科均须兼习算学, 盖以算学为讲求科学技术的必备学科。同时在书院的后山上建天文台, 购置仪器, 备观测天气之用。并在图书室内增购新的科学书籍, 备师生阅览。尤其是把以前个人研究的办法, 改为班级教学, 除每十日有例假一日, 谓之旬假外, 每日必须各按所习科目到堂听讲, 上午三次课, 下午二次课, 每次均50分钟。逐渐采取学堂的形式了。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张之洞又以所改的科目, 不是一般可以学习得好的, 有些太专门, 如格致、制造之类, 改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科, 始则仍是每20人各学一门, 逐日按时到堂听课, 后又改为兼习。旋复加授图画、体操等课。至于经史虽不上堂学习, 惟设分教一人, 按月考课一次, 以视学生课外对此有何深奥的研究。至考课的奖金, 仍照旧例。

关于学生的学业、操行成绩, 均规定以六分为足分, 三分为不及格, 这是那时书院计分的特点。在改革也就是班级上课以后, 每月学习, 均要月考, 年暑假前各举行大考一次, 其计分标准都是如此。但大考成绩均须监督复核才能定案。尤其是操行成绩, 监督要亲自评定。

学生的深造、成就和影响

经心书院从1869年开办起至1903年结束, 总计有34年的历史, 在这34年中, 专一研究古学, 注意个人自由学习的计有18年。改章后, 分科学习各项新的科学, 注意班级讲授的计有16年。在这两段的历史时期, 造就出的人才各有若干, 惜无统计可考。据一般的说法, 在书院肄业过的人, 取得科举功名如优拔贡、举人的极多, 依此成进士入翰苑的亦大有人在, 如周树模是翰林, 钱佩青、姚晋圻、傅守谦等是进士, 这不能说不是在书院那时代培养人才的成就。

嗣因改订院章后, 张之洞为适应他变法图强的主张与需要, 曾挑选三书院学生出国深造。据我所能回忆到的, 张之洞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挑选过李书城、孙庚、吴经明、何成浚、耿伯钊五人赴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又挑选两湖、经心两书院学生赴日本学实业和法政, 在经心书院被挑出的是: 权量学交通; 屈德泽学农业; 杨雨廷、叶开琼学法律、政治; 杨汝

梅、欧阳葆贞学会计。1903年又挑选三书院学生赴日本学师范，而经心书院被挑选出国的有张继煦、李廉方、阮毓崧、屈佩兰、万声扬、王式玉、吴咸卿、沈明豫、冯开浚等。在这以后一、二年派赴欧美留学的，在经心书院学生有史青赴比国学铁路，魏宸祖赴比国学政治，贺诚甫赴法国学数学，都是依照学科的难易，学到一定的时期回国，则又不能说不是一种新的成就。

张之洞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废除书院改兴学堂，从小学、中学、师范以至高等专门学堂，在省会逐渐设立，并普及于各府州县，其时各学堂堂长、教员，绝大多数是取之于三书院肄业过的学生。因此，在经心书院挑选出国学师范的和以前在书院中学经史和分科学习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的学生，都是分派到那些学堂去任堂长、学监和教员，教学成绩好，颇有声色，为各省所欣羨，纷纷前来参观仿效。由此可见经心书院学生在新兴教育中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

再具体说，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在省会开办支郡师范学堂甲、乙、丙、丁、戊、己六堂，为各府州县造成小学堂的师资，由各州县申送生员入堂肄业，每堂100人。那时六堂中的堂长仅经心书院留学师范的就选用了李廉方、阮毓崧、屈佩兰三人，王式玉、沈明豫、纪鸿等为学监，张继煦为全省学务处普通科科长。并另派吴咸卿为汉阳府中学堂堂长，邱岩（老经心）为汉黄德道完全师范学堂堂长。至于在当时文普通中学、两湖总师范学堂教国文、历史、读经等课的有黄福、孟晋祺、姚汝说、彭祁楨、傅廷仪。在湖北测绘学堂、文普通中学、女子中学、甲种工、农、商业学堂、汉阳府中学前后堂任算学课的有万声扬、蔡存芳、洪禧楷、邓文粲、熊世玉与毓福和我这些人，在那些学堂中任舆地课教员的有戴庆芳、王式金、喻其相、张湘、倪文云、叶开寅、童声等，任兵法体操教员的有胡之杰、闵毅、徐家升、彭时开等，皆是用其所学，在各该学科的教学，颇有威望，为当时学生所极为敬佩的。例如我当年在汉阳府前后堂中学教算学，在一次暑期考试时，全省学务处总办梁鼎芬前去查学，问学生长于何门功课，皆答以算学。因而在梁回武昌后，我受到其传谕嘉奖。

辛亥革命以后，在湖北教育界中任教的，大都还是上列一些人，如张继煦初任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后任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王式玉任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教育厅科长，屈德泽任湖北高级农业学校校长，熊世玉任湖北省教育厅科长。在王占元兼主鄂政时，那些人实掌湖北教育用人之大权，而任国文、史地、算学的那些人，各校还以聘之为荣。

在清末以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树模官至奉天巡抚，魏宸祖官至驻比利时大使，权量官至交通部长，杨介廉任湖北实业厅厅长，杨惠康任湖北财政厅厅长，张继煦任安徽教育厅厅长，李廉方任河南教育厅厅长，李书城任湖北民政厅厅长。其他如屈佩兰、李德寅在王占元治鄂时任湖北省议会正副议长，吴经明任北洋政府陆军部司长，史青任京汉铁路局汉局总工程师，杨雨廷任驻澳大利亚副领事，杨汝梅、欧阳葆贞任北京审计处处长和科长等职。

在辛亥武昌首义的革命中，经心书院的学生也是尽了一番心力的。如黄克强先生在武汉督师，抵御清军进攻时，李书城在黄先生麾下任参谋长，直接参与策划指挥，颇具勋劳。其时孔庚在山西任大同镇守使，积极响应武昌的独立，协同阎锡山举起义旗。在第六镇任统制的吴禄贞兵抵石家庄，正谋反清时，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而经心书院学生周维桢任吴禄贞之副官，只身救吴，不幸同时遇难。至于冯开浚在模范小学堂任堂长时参加革命，起义之初，被任为鄂军政府内务部部长。杨雨廷在任湖北法政学堂教员时，对辛亥革命人士有相当助力，起

义时被任为鄂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阮毓崧亦在鄂军都督府任过要职，被任为民政司司长。戴庆芳原在文普通中学堂任舆地教员，起义时就被黎元洪任为秘书，当时通电各省的文稿多出之于戴的手笔。武昌革命之获得成功，经心书院的学生们有其功劳。同时邓文燊亦于起义时至黎元洪作总统时均在黎名下任秘书，嗣因随军长冯某反对军阀张作霖，兵败遇害，似亦足以记述的。

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孔庚被任为省政府委员，李书城被任为建设厅厅长，耿伯钊被任为汉口特别市政府第二特别区管理局局长，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们是有贡献的。尤其是孔、李为救李汉俊、詹大悲都是不顾安危而进行的。以后，只有李书城没有再在国民党政府内作官，专任湖北通志周官官长，为湖北续修通志。

解放大军逼近湖北时，李书城、李廉方、耿伯钊、张继煦、贺诚甫、杨雨廷和我都是竭诚拥护共产党的。解放后，李书城被任为中央农业部部长，李廉方被任为中南区教育部副部长，耿伯钊被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张继煦被任为武汉人民委员会委员，杨雨廷被任为武汉市参事室参事，贺诚甫被聘为湖北省文史馆馆员，我亦被聘为武汉市文史馆馆员。（王义舟整理）

1962年9月

武昌文华书院及其身后华中大学

韦卓民

我于1903年进入文华书院读书直到文华大学毕业，接着又在文华大学、华中大学担任教员、教授、副校长、校长，先后历时48年。其中，还到美国的哈佛，英国的伦敦、牛津，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等大学当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又应聘到美国芝加哥、耶鲁、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特约讲师与客座教授。以中国基督教代表的身份两次参加世界基督教在英国举行的代表大会。以中华圣公会的代表身份参加在美国召开的两次总议会。因而对外国教会来我国传道和兴办学校的因由有所了解。

文华书院和文华大学

武昌文华书院，是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于1871年10月2日。校址原在武昌横街头，后于19世纪90年代迁到武昌花园山，即现在的昙华林。

书院之所以取名“文华”，是因为美国圣公会派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主教，中国姓氏“文”，后来的主教在武昌办了这所学校来纪念他，结合高尚典雅的中文“文章华国”的含义，定名为文华书院。

文华书院开办时，教会拉学生上学，全部费用由书院供给，第一年不过14名学生，第二年才24名，第三年增到30名，到第九年即1900年也只有90名。

教会出钱办学，出钱拉学生，是以培养教会传教人才为目的，大约在1878年，就曾专门开设了一个神学班，后来发展成为文华大学的神学院。从神学班、神学院出来的人，有很多分派到各地传教，不少成为圣公会主教、会长、会吏。

1903~1911年，我在武昌文华书院度过了学生时代。

1903年，我随同父亲由广东香山（现中山县）来武汉，那时我已14岁了，已读过七年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学过英文，只是不能“会话”，所以初进书院，被编到最低班。

那时书院监督（即院长）是英国人翟雅各。全院只有外籍教师四人，中国教师七人。共有学生144人，分七个班。每班每周有汉文10~12小时，分为古文4~6小时（作文在内），读经书3小时，史纲3小时。英文10~12小时，分为读本6小时，文法、作文4~6小时。数学（算术、代数、几何）6小时。地理（下一，上一、二、三班）或欧洲史（四至六班）2小时，理化（五、六班）2小时，每周共大约33小时。每日上课6小时，上下午各3小时。星期六下午不上课。

功课中注重英文、数学，而对中文学习则视同儿戏，老师讲的不起劲，照本宣读，学生则无心听课，大都偷看英文书或公开看小说。教中文的老师待遇也远不如教英文、数学的老

师，月薪少得多。当时英文、数、理、化老师月薪 50 元（银币，以下皆同），中文老师仅 30 元。所以文华学生，除在进文华以前中文已有根底外，很多人连一封中文信都不会写。

大学生中有英语练习会，大学生一律参加，每星期五晚开会，练习英语讲演、辩论，或听教师、来宾用英语作专题演讲。

文华高中学生的英语，已初步熟练，大学生则能自由运用，对答如流。高中除本国语文、历史课外，其余各科全用英语课本，教师全用英语教课。大学更是如此。可以说，文华学生的英语，的确是不错的。

为奖励学生，每年年终结业时，每班有第一名、第二名奖，均以书籍为奖品，在举行毕业典礼时一道颁发。每年还举行中文比赛一次，也发第一、二、三等奖。前三名的文章贴堂展出。

辛亥革命前，中学可以跳级。我进校时虽因英语会话不好，进了最低班次，但我在私塾中读了七年，中文程度较好，英语、算术以及“格致”（生物、理化）等课，入学后，除加紧学习英语会话外，我都应付裕如，成绩甚好，接连跳了几级，用四年时间学完备馆（中学）六年的功课。1907 年春升入正馆，即大学了。

学校对学生管理是严格的。中学有领班制，领班（总领班）由校长从五、六班的学生中选出，不论是否信教，不问功课好坏，只问是否操行好。领班向校长负责，协助校长与舍监管理学生，每星期六上午早餐后，全中学领班集合在校长室向校长汇报一周的学校情况以及学生操行。

一般学生平时不准出校门，除非星期六下午全校无课，可以请假，假要校长批准，限即晚六时半返校，参加晚祷。

文华分春季始业和秋季始业，每年暑假约有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每逢端午、中秋两节各放假三天，在这四个假期中，学生可以自由回家，寒假学生不准留校。

文华规定，所有学生，不论信教与否，一律都要参加宗教活动，不得违抗。1903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派人来校磋商，愿付重学费让他的孙子到文华学英语，只不参加宗教仪式，但未得到允许。宗教仪式每日早晚两次，每次大约半小时，按圣公会的公祷文进行，由校牧（会长）或牧师（会吏）领导举行，学生按规定坐、立、跪如仪。

每逢星期日，有宗教仪式三次，学生一律强制参加。其时间、内容是：上午 6：30 分圣餐（非信徒只参加前段）；9：00～10：00 圣经（非宗教仪式）；10：30～12：00 大礼拜。下午 18：00～18：30 晚祷（中学生参加）；19：00～20：00 大学生英文礼拜。大礼拜和英文礼拜都有圣职人员讲道。

文华书院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在当时是比较高的，1903 年，我为全自费生，每学期交纳 50 元。那时每人每月膳费不过一至二元，一学期按四个半月计算，大约 8 元。那么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可收入 42 元，不能说不高了。但就学院来讲，全自费的学生约为 2/3，有 1/3 “吃教”的学生全免费或只收膳费的。因而要完全依靠对学生收费来维持学校开支，还是不够的。然而“醉翁之意”在于传教，在于培养为其所用的“洋才”，外国老板也就乐于施舍、解囊。

文华书院于 1909 年申请美国立案后，改称“文华大学”，中国学校要申请外国立案，这难道说是什么治外法权？这是外国学阀在我国领土内称王称霸，其处心积虑，更是昭然若揭。

文华学生生活：伙食较好，早餐稀饭，三小菜，午晚两餐干饭，四菜两荤两素。食堂纪律严肃，有舍监管理，八人一桌，同时开动。校舍、寝室和公共场所，整齐清洁。学校设有医药室，可随时给学生看病。中学生平时不准离校，养成了以校为家的习惯，也形成与世隔绝的状况，而耳闻目见，尽是外国教会的东西。文华的学生生活方式虽不完全是外国式的，也不是中国式的，因而养成一些学生与我国社会格格不入，脱离实际，向往西洋，鄙视祖国。

教会的潜移默化

文华书院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活动，强迫学生听圣职人员“讲道”。但不强迫学生入教，甚至在学校供职多年的教职员工，也有不少人没有入教。就我自己说，从1903年到1911年在文华读了八年书，一直未加入教会。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那是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学期以后的事。

当初，我的父亲知道文华书院是教会办的，他一再叮嘱我说：“学他们的英文便好，千万不要吃洋教，卖掉了祖宗。”因此，我对教会学校引人入教，是时刻提高警惕的。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美籍化学教师 Richard，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理科硕士，为人和蔼，关心学生。一些患着小毛病的同学，要去院里一所教会小医院就诊，那里病人多，那里唯一苏格兰籍的医生，性情粗鲁，使许多患病的同学碰了钉子。而这位美籍老师，却自己备了一些普通药品，亲自给同学们看病，热情照护，感动了很多同学，更感动了我。我想这岂不是“博爱为德”的典型表现吗？也就是基督精神吧！

我在精神上已渐渐为基督精神所感染，文华大学毕业后，我就彻底违背了“不要吃洋教”的父教，接受洗礼了。

我在文华读书时，一向成绩好，名列前茅，早为英籍校长和其他英美籍教员所注意。刚毕业，就被破格聘用为大学一年级的数学教员和高中高年级的英、数教员，月薪80元，比以前的教员多30元，我自以为了不起。一年之后，我不过23岁，又被任命为备馆（即文华大学中学部）代理堂长，尤觉高人一等而沾沾自喜！校长翟雅各又叫我自修西洋哲学史、政治经济思想史，由他自己和另外两个英籍教员作为我的导师，要我注意研究古罗马和近代英国政治上的变革，鼓吹“不流血革命”。接着又要我担任大学的形式逻辑、西洋哲学史、比较政府学和政治学的讲课。这时我不仅为教会学校——文华大学所重视，而且为直辖文华大学的教会——圣公会所重视了。从此以后，我竟成为教会中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后我花了几年工夫，向文华大学写了一篇题为《孟子的政治思想》的硕士论文，用英文写出，于1915年在上海广学会出版。这就更加巩固了我和教会的联系，并在全国教会中提高了地位。

1918年，圣公会主教吴德施（Bishop L. H. Roots）替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取得助学金。那年夏季，我赴美国留学，1920年回国，晋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

日知会与《文华学界》

1904~1905年，一些有排满兴华革命思想的人，利用教会作掩护，在文华书院附近的花园山高家巷圣公会的另一教堂里开办一所阅书馆，名叫“日知会”，实际成为宣传革命排满的

机关。平时任人看书看报，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开会，有人前来演讲，宣传排满、兴汉和建立共和国的道理，有些同学前往参加，其中就有在备馆五、六班讲汉文课的三位老师。另一位是在正馆教诸子学的刘静庵先生，这位刘老师，端容正色，沉默寡言，在课堂上，两眼半开半合，严肃地讲解庄子、墨子诸书，毫不涉及其他问题，尤其不谈时务，不讲政治。但到日知会开会时，他却慷慨激昂大谈其革命排满。后来刘先生被捕入狱，清朝官吏曾企图治以死罪，因刘先生是教会学校的老师，有关方面和部分学生呼吁教会出面营救，经美籍主教吴德施通过汉口美领事馆电北京美公使转圜，使得清廷对刘先生不敢杀害，判为永远监禁，后病死狱中，不失为辛亥革命的先行火种。

与此同时，文华书院学生，在教师余日章先生的指导下，办了一个定期刊物——《文华学界》，不时登载一些涉及宣传革命排满的文章，我当时是《文华学界》编辑部的成员，也是经常用笔名“法兰西士”写这类文章的学生之一。

另有一部分学生，以传教为藉口，组织“十字军”（亦称“救世军”），举旗结队，吹号打鼓，走到黄鹤楼、阅马厂等人多的地方，进行“说教”，实际则间接宣传革命。有时上街的队伍还高唱自己的军歌：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坐视国步蹉跎？但望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

《文华学界》的言论，“十字军”的活动，引起了清廷官吏的注意。湖北巡警道冯少竹的儿子冯建统进入循道会办的博文书院，由于文华、博文学生之间的密切联系，从那里刺探文华学生的革命活动消息。

1906年冬季，我和几个同学带行李出城回家被军警拦住检查行李，目的在于搜查革命证据，逮捕《文华学界》编辑部成员。为此，必须设法应付，我和编辑部成员一道找英籍监督翟雅各要求辞去编辑职务，洋人愕然，问我们何以有此举。我们告以上述情况，他又问：“你们是不是革命党？”其实我们宣传革命完全出于爱国热情，没有加入革命组织，齐声答应：“不是。”他便说：“那么，有学校保护你们，只要小心你们的行李中有没有藏着宣传革命的书籍。《文华学界》是我们学校的刊物，与政治无关。”我们听了，感到有恃无恐。

革命排满的爱国情绪，是当时我国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教会和教会所控制的学校，自然也限制不了。

华中大学创立缘起

1924年华中大学在武昌文华大学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新成立的校董会选定孟良佐为校长，并推定我为副校长兼教务长。

为说明华中大学建立的缘起，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教会在我国的情况。当时基督教在我国派系复杂，美英帝国主义统治阶层为便于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希望教会合一。

美国以穆德（John. R. Mott）为首的基督教青年会乃是最好教会合一的桥梁。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原发生于英国，而盛行于美国。青年会声称，不分教会的宗派，不问教会的教义和历史，不拘任何一种的礼拜仪式，其口号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就是说单纯为社会服务。穆德在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下，连续召开过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旨在促进教会合一。

1922年，在上海举行中国全国基督教数千人的代表大会，我曾作为代表参加，会上鼓吹教会合一。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其经费全是穆德筹自美国的，成为促进中国教会合一的具体机构。首先以教会所办医院和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合作作为教会合一的先河。因为在中国的国立、省立的各大学没有上轨道的时候，教会学校还能吸收一些学生。但到本世纪20年代开始，公立各大学越办越好，私立大学除少数“野鸡大学”外，也在日有改进。教会大学有鉴于此，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力图巩固，免遭淘汰。

教会大学调整合并的初步计划是分全国为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五个区：

华北有北京的燕京大学与济南的齐鲁大学。

华东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和苏州的东吴大学。

华南有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

华西有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

华中有武昌的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大学部，长沙的雅礼大学，岳阳的湖滨大学，益阳的信义大学。

上述教会大学之中，力量最分散，内容最空虚则是华中区的几所大学。其中历史较久、基础较为巩固的要算武昌文华大学和长沙雅礼大学，其他大学都以这两所大学的马首是瞻。但在真正洽谈合并时，困难很大，这是因为文华大学是美国圣公会经办的典型的教会大学；雅礼大学虽具有教会大学色彩，实际上是美国耶鲁大学一些毕业同学组织的私人团体——“雅礼会”所创办的，不属任何教会，雅礼大学在长沙开办日久，不愿离开；而作为文华大学后台的美国圣公会，以武汉为两湖传教事业中心，更不乐意外迁。在华中区的其他几所大学，也都徘徊不前。

当时鼓吹教会大学合并的外国传教士，以汉口圣公会吴德施声望最高，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图谋最力（孟于1917年继翟雅各为文华大学校长）。他们奔走联络，几经磋商，得到汉口英国循道会和伦敦会的支持，将博文、祷学两个书院的有关学部与文华大学合并，改为华中大学。

新合并而成立的华中大学，渺小得极为可怜！全校教师在文华中学兼职的占过半数，还有在教会兼职的，合零为整，共计只能作12个教员，大都又是学无专长，不能称职。以图书计，虽有中、美书籍各三四万册，有用或无用的中外文期刊杂志10多种，却没有添置的经常预算和计划。至于科学仪器（物理、化学、生物），共值不过两万元。据雅礼大学校长胡美对我说，雅礼还比不上华中。其他教会大学也大都加此。

1926~1927年北伐军经湖南到达武汉，作为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教会学校纷纷停办。华中大学在1927年5月也呈准革命政府，宣告停办。到了1929年，湖南的雅礼大学，岳阳的湖滨大学，都无意恢复，相继将其教员、学生和图书、仪器合并到华中大学。这时华中大学的后台有：汉口的美国圣公会、英国循道会、英国伦敦会和岳阳的复初会和长沙的雅礼会。喧嚷多年的华中区教会大学合并的企谋，真正实现了。

华中大学的兴盛时期

按照英国大学教授七年中有一年带薪休假之例，圣公会资助我赴英进入伦敦大学当研究生，在霍布侯斯（Hobhouse）教授指导下继续研究哲学。学院还承认我在哈佛大学两年研究生的学历。我在英国留学两年，在伦敦大学规章许可之内，用了大半年时间赴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听讲，我的博士论文提前一个学期在德国完成，并由我的指导教授霍布侯斯审阅通过，完成所需要通过的考试，取得博士学位。霍布侯斯教授叫我把剩下的几个月时间去牛津大学借读，听哲学课。

圣公会支持我去美国留学，是另有用心的。因为，英国教会传教士向来学术上看不起美国人，也看不起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如果美国教会要想同英国教会合作，就要找一个能在学术上沟通美英思想的人，如能找到一个在学术上能够压倒英国传教士的中国代理人，那就最理想不过了。我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又在著名的牛津、柏林、巴黎大学听过课，满足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对我的期望，也达到了英国传教士对华中大学校长资格的要求，对完成华中区教会大学合并有所帮助。

合并后的华中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三个学院，共有教职员 24 人，学生 57 人。

校舍全部是圣公会的，合作的循道会、伦敦会也拿出一点钱和就近拨出几栋房扩充了校舍。

校董会通过全校开支预算为 5000 元，全由学生学费收入开支。这时学生学费每人每年两学期 100 元，宿费 40 元，膳费 60 元，是颇为昂贵的，一般家庭不能负担。图书馆（即文华公书林）的一切开支，则由圣公会负担，与图书馆专科学校共同使用。

作为华中大学后台的五个单位名为合作，实则貌合神离，彼此推诿，各有打算，随时准备拆伙。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全权”校长，处处受到阻碍。要求校董会通过校舍、图书、仪器的经费，特别是通过各单位所负担教职员工资。传教士们严重限制了校长的实权。

如何摆脱传教士们的束缚，巩固校长的职权，我认为，首先要不通过教会，由校长自行筹集学校经费和建筑费、设备费，其次就是要由校长直接和这五个单位在美英的教会组织取得联系而不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获得我国教育部和湖北省政府每年一二万元的补助之外，还争取到中美、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的每年二三万元的“津贴”。我认为最大的希望，要算设法由我自己的努力以增加美英教会的直接拨款，并取得美英两国的私人捐助。

1931 年我应邀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在哈士卡尔基金讲座作特约讲师，主讲中国儒家的伦理学。同时美国耶鲁大学也约我去在该校主办的暑期中学校行政人员比较教育讲习会讲课。暑期后又在该校研究院作为伦理学客座教授一年。利用这个机会，我和美国圣公会、雅礼会和复初会董事会的主要人物取得联系，打破了在中国的传教士的中间隔阂。美国圣公会与复初会增加了对华中大学的常年捐助，并募得扩大校址所需购买基地的款，以及计划的文学院大楼建筑费。从此，学校经费虽然少，但是相当稳定，学校得到了稳步前进的基础。

193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华中大学立案。

在1929~1935年这6年中,华中大学教职员由24人增加到50多人,男女学生从57人增加到200人,总算有所发展。

在此时期,学校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学生升级毕业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大学头两年四个学期的功课,必须按各系规定全部读完。考试合格,学校还要举行一场非常严格的“中期”考试,包括中文、英文和两项专业,是算两年学习的总帐。“中期”考试不及格的,仍须重读第二年的功课。学生读完三、四级全部功课在班内考试合格后,学校又要举行一次统考,算整个四年的总帐。在管理上,男女学生分别安排住宿,每宿舍设主任,负责管理宿舍的工作,平时学生不准离开校园,外出必须请假,以养成一种认真读书的校风。1935年以前的六届毕业生都获得较好的成绩,学生品德上从未出现过较严重的问题,博得了社会的信任。

教师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级,升级由校务委员会所选出的12位教授组成专门委员会,按固定条例经过讨论后,以不记名投票逐一通过办理,任何人不得干涉或更改。以此促进教师钻研学术,杜绝倖进。

会计主任和校长一样,由校董会选定,对校董会负责,按校董会每年所通过的预算开支,任何人不得干涉,校长也无权更改预算。教职员的工资,会计处绝对按月照聘书规定分送。

校务会议和院、系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处理各自范围内有关事务,关于课程的兴废、修改与实施,由全体教师组成的教务会议讨论处理。

1937年7、8两月,世界各教会在英国牛津大学与苏格兰的爱丁堡举行代表大会,我为中国各教会代表人之一。我到达英国后,七七抗战爆发了。匆匆参加代表大会之后,又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作第二次客座教授讲课,为华中大学进行募捐,没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我心里盘算着学校搬迁的事,向在美国的华中大学设立者大会提出一笔搬迁费的预算,也没有结果。

从抗战内迁到复员故地

抗战开始后,我正在英国,极力主张华中大学迁往后方,写信向代理校长建议,再向校董会提请讨论。可是校董会受美国圣公会代表孟良佐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我国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即使日寇打到武汉,对美英教会合办的华中大学,也不会进行摧残。很多人受其影响,都主张不过早迁移。直到武汉各校开始后迁,华中大学才开始准备。1938年7月我由英转美,得知学校已决定迁往桂林,我按学校所提出搬迁预算,筹足款项汇回武昌。

当我由美国飞香港转道到达桂林时,已是8月15日,学校师生先几天到了桂林。当询及搬迁情况,才知从武昌运来的图书不过百分之四五,仪器不及四分之一。当即决定派员回武昌抢运,而水陆交通业已阻塞,损失甚大,这才使大家痛恨,上了美国人孟良佐的当了。

学校在桂林初步安定之后,开始上课,师生员工,精力充沛,表现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和团结合作的大家庭精神,令人感动!可是从10月下旬起,日机频繁空袭桂林,学校几乎不能上课,于是又不得不作再次后迁之计。

经校务委员会决定,再迁云南,后经派员调查确定为喜洲坝。1939年元月全校教职员工、家属和图书、仪器分批乘汽车经河内转昆明再到喜洲坝。喜洲坝在大理城北40里,风景幽美,确实是个“世外桃源”,我们在这里闭门办学,为时七年有半。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才启程迁回武昌原址。

我为了要去国外劝募重建校园的款项，抗战刚结束，即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之聘，先行离开喜洲坝，第三次赴美讲学。1946年6月由美赴英。8月下旬，由英乘飞机经印度到达武昌时，华中大学已经准备在9月初开学了。但是，要真正开学上课恢复旧观，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第一，从1929年至1937年，华中大学学生程度有着大幅度提高，毕业学生，都是经过无数次严格考试的。迁云南极西的后方，那里中学生少，程度低。如要经过严格筛选，就无法招收学生。所收大学一年级学生，甚至高中一年级程度都不能达到，经过学校教学、考试、在校读了四五年甚至有读了六年的还不能达到华中大学原来毕业生的水平，也只得降格让他们毕业。

第二，偏处滇西的喜洲坝七八年，生活单调而且艰苦，许多资学较优的教授、副教授和喜欢活动的青年教师，相继远走高飞。特别遭到削弱的是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其他各系教师也不得不降格以求。

第三，经过日寇七年的蹂躏，武昌校舍“徒空四壁”，连地板都被拆掉了，房屋的修理、安装，图书仪器的添补，需费巨大，不能即时筹到。

以上三个问题是华中大学复迁武昌的刻不容缓，而又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也是最伤脑筋的事，从1946年直至1949年解放前，都没得到称心如意的解决。

司徒雷登计划的破产

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着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大学联合托事部的接济和支配。联合托事部的主席范杜生是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院长，1945年就任院长典礼时，刻意反共，坚持侵略我国的杜勒斯为他在会上大事鼓吹。另一个支持他的是美国《时代》和《运气杂志》的老板兼总编辑的路斯(Henry C. Luce)。而给这些人提供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消息，设计合并教会大学，制订实施办法，以适应美国对外发展势力需要的，则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浙江杭州，他的父亲是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他善操中国语言，返美受过大学教育与神学教育后，又回到中国教《圣经》的《新约》和希腊文。司徒雷登1919年被派为燕京大学校长。其主要任务是拉拢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在燕京大学设所谓“社会服务系”，主要培养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这类推动教会合一的人才。中国教会大学托事部1945年在纽约拟订的计划，据我所知是由司徒雷登草定的。

这时，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学校原以为我会带家属来，给我配给一所教授住宅，计有两间大卧室，一大间膳厅连客厅，一间书房、浴室、厨房，一切设备俱全，我个人住不完。而那时纽约旅馆拥挤，收费昂贵。司徒雷登正在纽约，我同意他和我同住。当时，我忙，他也忙，夜间见面寒暄几句，从未深谈。司徒雷登对联合托事部的事缄口不言。

四、五月间，司徒雷登和马歇尔一道乘马歇尔的专机返回中国。这使我大为诧异。那年7月他就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计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联合托事部准备向抗战时迁往后方的教会大学施舍一笔复员费，要教各教会大学唯命是从；第二部分则是合并教会大学，它规定在中国只能有五所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是华北的唯一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只留下在济南的齐鲁医学院，其他院系合并燕大。燕大设文、法、理、工和神学五个学院，各学院不但系别多，而且都有不止一个研究所，为其他各教会大学，除医学院外，培养师资，从而使燕大成为各教会大学的母机制造厂，控制和领导全中国的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待别加强燕大的法学院，其规模简直是一个法政财经学院，培养法律、政治、财政、经济、外交、新闻和社会工作人材，准备透入我国政治和其他各个领域中去。

除把燕京大学建成为领导教会大学外，还准备建立华东、华南大学，稳住华西大学，华中大学则在可有可无之列。

华东大学，合并原有的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第一部，设文、理、农三个学院，以农学院为主。合并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设文、理、法、商、医五个学院，但不设研究院。联合托事部以经济手段向各大学施加压力。

华南大学，旨在合并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不设研究院，只限大学本科。

华西大学照旧，只设文、理、医牙（口腔科设在医学院内）三个学院，系别尽量裁减。

华中大学，按联合托事部计划，准备不办。由于纽约华中大学设立者大会的坚持，托事部才列入计划，只设文、理、教育三个学院，八个系。

司徒雷登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要合并分散的教会大学，集中力量，以与我国公私立大学抗衡，争学生，抢青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司徒雷登在中国扩展美国势力的计划，也包括他的合并教会大学的计划破产了。

1964年